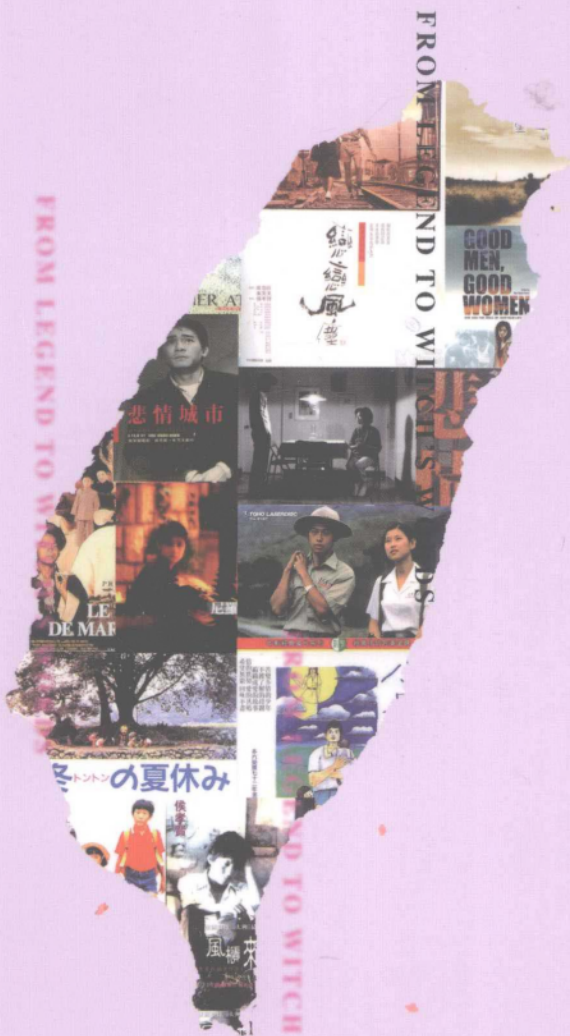


# 从《传说》到《巫言》

FROM LEGEND TO WITCH'S WORDS

朱天文的小说世界与台湾文化

卓慧臻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FROM LEGEND TO WITCH'S WORDS

# 从《传说》到《巫言》

FROM LEGEND TO WITCH'S WORDS

朱天文的小说世界与台湾文化

卓慧臻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 瑞 刘姗姗

责任印制：冯冬青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传说》到《巫言》：朱天文的小说世界与台湾文化/卓慧臻著.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9.1

ISBN 978 - 7 - 5032 - 3578 - 8

I. 从… II. 卓… III. ①朱天文 - 小说 - 文学研究②文化 - 研究  
- 台湾省 IV. I207.42 G12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8902 号

---

书 名：从《传说》到《巫言》：朱天文的小说世界与台湾文化

---

作 者：卓慧臻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 邮编：100005)

<http://www.cttp.net.cn> E-mail: [cttp@cnta.gov.cn](mailto:cttp@cnta.gov.cn)

发行部电话：010 - 85166507 85166517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版 次：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11.25

印 数：1~2000册

字 数：170千

定 价：28.00元

I S B N 978 - 7 - 5032 - 3578 - 8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绪 论 / 1

颓废与文化 / 2

唤起三千个士 / 5

### 第一章 文学家庭背景 / 9

洋教儒学 / 9

诗意 审美 台湾士绅 / 13

眷村文艺青年 / 15

理性与感性 / 21

### 第二章 桃花源里的咏唱 / 33

正气之歌 / 34

礼乐政治 / 42

田舍桑园 男耕女织 / 46

楚辞：英雄的召唤 / 52

### 第三章 发现新电影 / 57

小毕的故事 / 57

启蒙与少年 / 64

落入凡间的精灵 / 68

凝视老台湾 / 73

### 第四章 恋曲一九九〇 / 83

纯真时代的结束 / 83

艺术化的自恋者 / 89

国际化 多族群混居 / 91

享乐的城市 / 97

感官沉溺的绝路 / 100

## 第五章 航向乌托邦 / 105

《荒人手记》的寓言 / 107

现代或后现代? / 114

是升华还是堕落? / 117

空间的追寻 / 122

一个高贵的现代人? / 129

## 第六章 瓦解的时间 / 133

巫看综艺岛 / 133

恐龙伯母与 E 人类 / 136

马克白的垃圾队 / 139

父亲的死亡 / 143

灰烬复燃 / 148

## 尾 声 / 153

魏晋高士的颓废 / 153

寻求新灵感的中国现代文学 / 156

欧洲十九世纪末与民主潮流 / 160

台湾“现代士”的矛盾 / 162

## 参考文献 / 167

朱天文作品 / 167

英语译文 / 168

中文引用书目 / 169

外文中译引用书目 / 173

外文引用书目 / 173

# 绪 论

朱天文是谁？这个名字许多大陆读者并不熟悉。不过，只要说明她是台湾导演侯孝贤众多电影的编剧者，马上就有许多粉丝记得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朱天文与侯孝贤剧组合作的电影以创新的实验形式，引领“台湾新电影”的发展。由于作品风格优雅，朱天文被誉为“长期跨行电影工作，并且获得成就的唯一女性小说家”。<sup>①</sup>

大体而言，朱的家庭背景和文化信仰，使她的早期作品带着一种典型的大陆赴台移民者所持有的精英贵族心态，最早出版的两部短篇小说集《乔太守新记》（1977）与《传说》（1982）反映了她个人对中国伦理哲学的喜爱，直到为“新电影”工作期间，面临乡土运动激烈的争战，受到本土文化的浸染后，她的写作方向才有了改变。《世纪末的华丽》（1990）对当代台湾社会关于性、性别、女性和父权主义的纠葛有着生动的描绘，首次突显她对社会中颓靡现象与语言的熟练驾驭，《荒人手记》（1994）使用个人徘徊于道德与情色间的困难抉择，以彰显台湾当代社会文人的内心冲突。

随着年龄的增长，朱的写作对象也变得复杂，逼视的问题也涉及较多关于人类的处境。她的近期创作揭示的并不只是那些影响她的中国现代文学源流的关系，也是台湾当代文化思想的前端。尽管已有许

---

<sup>①</sup> 李天铎、陈蓉芝，《八十年代台湾（新）电影的社会学探索》，见李天铎编《当代华语电影论述》（台北：时报出版社，1996），第49页。

多学者谈论她的个别作品，但是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部专著有系统地研究其作品，本书希望能弥补这个空白，分析她至今所有重要的作品，并解释其内涵意义。选择朱天文这样一位仍在积极写作的作家作为本书的主题，不仅是因为她杰出的文学成就，更重要的是，研究她的作品对理解台湾过去三十年来社会与文化的巨大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 颓废与文化

从表面看来，朱天文电影小说中的本土观点，以及《世纪末的华丽》与《荒人手记》中受人争论的情色内容，很容易模糊了她作品中的基本结构：一个传统士大夫模式的社会思想，如何冀望在变化迅速的台湾现实中追求平衡的思想。作为一个坚定的传统者，她似乎从不愿放弃自己对一个有序社会的想法，然而，台湾的文化发展和民主政治不可抵抗的诱惑将她引入道德性的苦境，导致她近期作品中过度使用感性语言，着魔于颓败社会，彻底变成一位“颓废”作家。因此，本书的主旨在找出一个属于中国文化里颓废的本质与内容，同时揭示朱天文作为一名台湾作家走向颓废这一段经历的文化意义。

此处简单讨论颓废的意义，以便提供一个学者们对朱天文作品评论的背景框架。法文“*Décadence*”一词是从拉丁文 *Cadere* 转化而来，原有堕落的意思。在西方文化中，此词大都与二千多年前罗马帝国的衰败相联结，意指文化上从一个盛世堕败而下，显现了一个萎缩的世界——人人沉浸于自我的空间，通过艺术性的过度修饰与放荡的行为，追求新的刺激。

这个词语在现代用来特别是与欧洲十九世纪末（*Fin-de-siècle*）艺术、文学以及象征主义、美学运动、新古典艺术等的生活形态相关。一些艺术家与作家如毕尔兹莱（*Aubrey Beardsley, 1872 ~ 1898*）、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 ~ 1900*）及亚瑟·芮邦（*Arthur Rimbaud, 1854 ~ 1891*）的作品与生活正是此例。珍妮弗·伯凯（*Jennifer Birkett*）将展示在现代文学中的颓废心理状态归纳如下：“同时大胆反抗与温顺

服从，祈求的是一个立即冰冻、框住、局限的能量，并耽于颓塌与荒芜的影像。”<sup>①</sup>

李欧梵强调中国现代文学出现过这样特别的颓废现象。他将颓废视为一个产生于都会文化背景的“唯美形式”，认为正是“都会的感性”促使三四十年代上海作家包括：刘呐鸥、穆时英、张爱玲等创作出带着异国情调生活主题的作品。<sup>②</sup>李认为朱天文在《世纪末的华丽》中所描述的模特儿与都会物质环境十分类似上海的现代作家，因而将她放置在“现代颓废文学”的系列上，李甚至连结张爱玲与朱天文对现代都会的描摹，彷彿朱是张爱玲小说的当代版。<sup>③</sup>王德威对张爱玲的看法与李接近<sup>④</sup>，但把朱天文放在一个较为清晰的台湾背景上，他总结朱对台北一九九〇年的刻画与西方“世纪末”哲学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处。<sup>⑤</sup>张诵圣则认为朱天文的作​​品跨越时空，显示了“后现代情境”的台湾新都会文化。<sup>⑥</sup>

综观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朱天文的作​​品似乎适用于“颓废”、“世纪末”，或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然而，这种寻找类似以及比较不同的方式有着将朱天文作品特色简化的危险，批评家们即使提到了朱作品中的颓废现象，对于朱与中国现代作家，特别是张爱玲的作品有何不同

① Jennifer Birkett, *The Sins of the Fathers: Decadence in France 1870 ~ 1914* (London: Quartet Books, 1986), p. 5.

② Leo Ou-fan Lee, "Decadence: A Tentative Essay on the Relevance of a Concepti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European Context: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Sinological Symposium, Smolenice Castle, June 22-25, 1993*, ed. Marián Gálik (Bratislava: Institute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of the 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1994), p. 21.

③ 见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的颓废及作家》，《当代》，第93期，1994年1月，第46页。

④ 王德威着重于颓废与现代性的对话关系，强调“颓废”异化之正常性，以美学风格及思考现实的方式来讨论晚清小说中的颓废风格，认为张爱玲对疲惫都会的描述是一九四〇年代中国颓废文学中最具说服力的讲解者，见 David Der-wei Wang, *Fin-de-siècle Splendou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17. 参见 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51 ~ 224.

⑤ David Der-wei Wang, "Fin-de-siècle, Splendour: Contemporary Women Writers' Vision of Taiwa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vol. 6 (1992): 42.

⑥ Sung-sheng Yvonne Chang, "Chu T'ien-wen and Taiwan's Recent Cultural and Literary Trend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vol. 6 (1992): 62.



并未仔细探讨，比方说，为什么张爱玲的作品中没有朱天文这种创伤式的性爱、情色主义与绝望的沉溺？

朱天文并不仅仅是张爱玲的另一位模仿者，她的作品并非肤浅性地呼应了欧洲世纪末的颓废主义，或者是所谓的现代中国颓废文学。朱近期作品承载着荒唐、放荡与种种表现人生孤绝的景象可从她早期乌托邦理想中去理解。经过台湾本土化冲击，朱面对理想破灭的反应是痛苦与矛盾——这点，如同我在本书结论一章将会说明的——在中国古典文学可以找到同例。

在区分朱的近期作品与欧洲的颓废作家时，我们应该了解到，颓废不应只是个形式的问题，而是关于道德与美感二者的冲突。<sup>①</sup> 颓废者乃受其强烈的美学主义趋使，放弃了一个持续的道德意识。而朱天文不似王尔德：“厌倦了处在高点的我，执意要追求新感官刺激的深度”，<sup>②</sup> 朱的颓废在于她的书写主题。我们可以说王尔德是以一个自我沉溺的享乐者书写作品，但如果说朱天文把自己归于王尔德类型，那就显得荒谬了，检视朱创作动机之主要源泉时，我们可以解决一个为何这样明显不是自我享乐的作家却创造出令社会震惊的感官小说之悖论。

欧洲文学研究者认为，颓废是贵族的一个文化姿势，特权贵族执著于美感乃是由于自身品味与日渐扩张的中产阶级之平庸趣味相抵触，以及与所处社会兴起了的民主潮流格格不入之故。<sup>③</sup> 面对台湾内部逐渐进入民主政治生态，朱天文原有的价值观受到挑战，对多数人而言，民主政治的启蒙意味着社会制度的进步，但在朱天文的眼里却是走向毁灭的前兆。朱天文表示过：“《世纪末的华丽》，借的是上个世纪末奥地利的

<sup>①</sup> Søren Kierkegaard, *Either/Or*, trans. David F. and Lillian M. Swenson, rev. Howard A. Johnson, 2 vols.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Anchor, 1959), p. 32.

<sup>②</sup> Oscar Wilde, *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 (London: Collins, 1994), p. 1026.

<sup>③</sup> 一八九〇年的英国美学运动的作用涉及阶级的问题，见 Regenia Gagnier, *Idylls of the Marketplace: Oscar Wilde and the Victorian Publ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86), p. 6. Gagnier 表示对于维多利亚晚期产生的特殊形式最有益的美学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那是由阿德诺精述，后被彼得·柏格 (Peter Bürger) 在《先锋的理论》(*Theory of Avant Garde*) 一书中复述的理论。阿德诺与柏格皆认为美学主义的功能是“将艺术理论化，使其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无实用特质的范畴，以否定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理性”。

画家克林姆（Klimt）的画。”但她关心的似乎不是华丽缤纷的景象，“羞耻心如果是旧的好东西，恬不知耻就是新的坏东西。我从恬不知耻着手，写出来这本《荒人手记》”。<sup>①</sup>

诚然，颓废的定义众说纷纭，本书所指的颓废为——原作为社会中心的道德价值观在写作中的解体，这种解体的精神痛苦，以及处于这种解体过程中，艺术反而获得（或努力取得）的一种美感。九十年代的台湾由于物质基础达成所以有了颓废的可能，更重要的是，经过本土化的运动，颓废才得以自觉。<sup>②</sup>朱的作品并非如十九世纪末欧洲作家企图以贵族品味颠覆传统社会的表现，她的小说主题与语言日趋感性的现象应被理解为她在放弃了“士”为社会之心道德价值的痛楚。

## 唤起三千个士

朱家姐妹在七〇年代领导文学社团“三三社”时有句“唤起三千个士”的口号。我们或许要问，为什么朱家姐妹不是要动员三千或三万人民，而是“三千个士”？究竟“士”的理想概念如何影响朱在每一个不同时期的写作呢？为什么朱要公开地宣传这样的精英主义呢？

学者黄锦树认为朱天文的文章深受胡兰成的影响。<sup>③</sup>对此看法，朱天文直到一九九六年，《荒人手记》出版两年后，才打破沉默，撰写了最长的一篇自传，陈述她与父亲朱西甯、胡兰成与张爱玲的文学渊源，朱的自传帮助我们了解她与这三位作家文字风格的类似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朱、胡、张三人有着完全相同的意识性信仰或社会文化观。张爱玲从未领导任何文艺美学的活动，而胡的特长在于政治新闻写作而非小说创作。他们对朱天文的影响虽然重要，但朱自有其生长的背景以及社会

① 朱天文，《废墟里的新天使》，《自由时报》，1999年，9月3日。

② 目前讨论中国当代颓废思想的文章并未论及美学的特性，而是强调颓废主义的消极面，参阅张器友等著，《世纪末中国文学颓废主义思潮》，（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第17~18页。

③ 黄锦树，《神姬之舞：后四十四回？（后）现代启示录？》，见朱天文，《花忆前身》（台北：麦田出版社，1996），第298~299页。

经验而成就个人的格调。可以说，这几位活跃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作家给予生长在台湾的朱天文一个与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一种历史性的联系。

关于“士”的概念其实无须在此多说，众所周知，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为君权统治，君主之下分为“士”与“民”。“士”辅佐君主，成为一般大众的领导，儒家思想又将“民”区分为农、工、商等各阶层。在封建社会中，“士”的特质不仅是替君主实行朝廷政策，在生活中务必严持道德操守，掌握个人的行为准则，以维持社会、国家的和谐。清朝之后，尤其在五四启蒙时期，“士”的概念逐渐被西方现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所代替。（但朱从不自许为西方式的知识分子，这在第二章将会详述。）

儒家思想强调以四书五经这样一套固定的古典文籍作为士大夫学习与训练的目标，<sup>①</sup> 可说是一种选择性的“开放式的贵族主义”（meritocracy）。美国学者彼德·包尔指出，中国文化与政治向来由这种被称为士的少数精英分子所控制，而这个群体往往是通过自我招募的形式发展：“士的学习是具有历史性的，它是由那些阅读同样的文本（text），共享一套价值观，而且是互相认同彼此的人们组成。这是他们的智文化。”<sup>②</sup> 属于社会高阶层的士大夫，学习与写作是必备的能力，他们要能够依据古典文论作出智性分析与逻辑性的辩论。正如《论语》所说的，“民可使行之，不可使知之”，<sup>③</sup>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唯有士大夫同时是社会与伦理准则的创始者，也是观护者。<sup>④</sup> 虽然最终的政治权力在于君王，士的作用为保有道德标准的主体，这些士子们有维护（宣称）他们智性权力的责任。简言之，“士”被授权作为知识贮存的团体，社会通过士子

<sup>①</sup> “科举制度”，施宣圆、王有为、丁凤麟、吴根梁等编《中国文化辞典》，（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第422页。

<sup>②</sup> Peter K.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s Transition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

<sup>③</sup> 论语8/9，见贾庆超、郭德芳，《论语新读》（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第257页。

<sup>④</sup> 关于士如何控制“困难文本”，参阅赵毅衡，《必要的孤独》（香港：天地出版社，1995），第202页。

们对四书五经的掌握，巩固了道德标准，进一步维系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sup>①</sup>

“士”这个概念在中国封闭的社会系统中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因此没有什么争议之处，至少朱天文是这样看的。而颓废这个概念则没有一致的理解，它被应用在某种欧洲形式的世纪末，或是中国传统文化某时期（例如魏晋或晚清）的一种文化趋势，以及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种写作倾向。朱天文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与这三种解释都有相似之处，不过这些类似点不应干扰我们认识朱天文对社会及其病变的看法，促使朱追求唯美的原因在于士的社会功能面临了危机，台北都会的颓废风尚啃蚀了传统士的理想。

本书第一章从朱天文的家庭背景教育谈起，着重讲四位现代作家对她个人风格形成的影响。由于参与三三社的过程是朱天文乌托邦思想的高峰期，第二章借由朱的散文集《淡江记》（1979）以及短篇小说集《传说》（1982）理解朱天文的爱情与政治观中隐藏的儒家因素。第三章将检视朱面临转变的初兆，成为“台湾新电影”的编剧后的朱天文于一九九一年出版《朱天文的电影小说集》，其中部分作品乃改编其剧本，部分则为电影剧本的前身，仍具小说的风貌与特质，代表朱拓展写作范畴的轨迹。

第四章分析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目的在于以稍加具体的内容，展现朱所描绘的罪恶之都，例如文中对老化的肉体、浪漫幻想、人工化城市等议题的铺设。朱体现了生活在非道德化的城市中，寂寞的台北人似乎不能免于沉沦的命运。

第五章讨论朱天文如何以长篇小说《荒人手记》表现爱恋情欲的多层面貌，尤其是个人面对道德与堕落的选择；在性与爱的两极矛盾中如何寻求平衡的历程。此章亦探索朱天文使用李维史陀与傅寇思想的意义，由于傅寇的理论触及男同性恋在异性恋社会所受到的压迫，本章的内容也将以此为中心探讨朱的主人翁是否只是一名不为异性恋社会所容

<sup>①</sup> 张茂桂，《知识分子与社会运动》，萧新煌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主流图书公司，1993），第201页。张指出西方式的现代知识分子是“现有秩序的破坏者”，这与中国传统士为秩序的守护者有所差别。

的同性恋者？朱暗示着：作为一名“士”，主人翁的社会职责及道德准则与所处社会的互异，其传统思想在当前的台湾社会中无法维系。第六章分析长篇小说《巫言》，显示朱对作家与士大夫职责的重视。本书尾声讨论朱天文的颓废写作与其个人作为“士”的角色理想是否相符？她的感官写作、乌托邦思想将分别与魏晋群士，以及三四十年代中国作家作比较，以便说明朱的颓废既不是魏晋群士所强调的与权威对抗；也不是单一的感性倾向，她的作品表达的既是丰富的感官愉悦，也是社会责任的延展。

# 第一章

## 文学家家庭背景

### 洋教儒学

朱天文父亲朱西甯（本名朱青海，1926～1998），祖籍山东临朐，自小生长在一个重视传统儒学以及信奉基督教的家庭中，祖父“每用孔孟来论释基督的道理”，是清朝时期的传道人。<sup>①</sup>朱西甯的叔父任教南京金陵神学院，教外国人官话，一九三六年《圣经》译本是他根据《新约》原文（希腊文旧希伯来文）校译而成，公认为善本。朱西甯父亲从商，在县城开牧场。朱西甯为家中的老么，上头十个兄弟姐妹多离家求学接触西方文化并自由选择婚伴，当他们放假返家即与朱西甯讲述五四运动与文学的消息。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间，加入国民党后的兄弟姐妹回到山东老家，希望给予现代化的影响，开明的父亲非常支持，捐地出资，建立带有公共娱乐与教育设施的现代化的社区，并主办、发行一份报纸。

青少年时代的朱西甯适逢抗日战争，国共对立，生活环境并不稳定，其足迹遍布大陆苏北、皖东、南京、上海等地。在杭州艺专就读时受姐姐引导喜欢上张爱玲的作品，原因是：和左翼作家相比，张的作品没有灰暗的政治话题，而是十分吸引人的日常生活写照，张对爱情与婚姻“大胆生

<sup>①</sup> 李昂，《朱西甯访问记》，《书评书目》，第16期，1974年，8月，第116页。

动”的描述启发了朱西甯对文学世界的兴趣。<sup>①</sup>朱西甯最初的创作并未如张爱玲般书写恋爱婚姻的题材，而是自身的社会经验。一九四七年，二十岁的他在南京《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洋化》，写的是中西文化的差异，讽刺试图模仿西方文化的中国人。两年后，朱西甯随着国民党到台湾，离开大陆时，他只携带了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

踏上这个距离福建沿海不远的岛屿，一切都是陌生的，这里未开发的景致和繁华的上海、南京截然不同，朱西甯回忆当时的心情是失落的。由于台湾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都是日本殖民地，他在大陆看到的大陆版图“没有台湾”，“地图上的台湾颜色与日本领土”一样，图上没有任何显示台湾地理特质的标志，没有山、河、城市或铁路。<sup>②</sup>如同所有来到台湾的大陆人一样，朱西甯认为台湾是个暂时委身的地方，是个“反共基地”。到了台湾的朱西甯对失去的祖国和自己那一个大家庭无限怀念，他所欣赏的现代中国作家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全变成美丽的乡愁，传给他的女儿。<sup>③</sup>

由于当时来台的大陆人与台湾本地人对“反共复国”的口号没有任何共识，因此造成彼此关系紧张。如今政治风尚转移，很难想象这种庞大的“复国”野心能令人严肃以待，事实上，这个政治迷思直到八十年代末期才被台湾锐势的经济系统替代。朱西甯在台担任军职期间致力写作，自一九五二年起出版了三十多部短篇故事集、长篇小说、散文、评论等重要著作，获得诸多文学奖章，被誉为“军中作家”。他曾担任《新文艺》月刊主编、黎明文化公司总编辑和中国文化大学的教务工作，活跃于各种文艺盛事，戏剧、文学奖赛，并经常主持学院的座谈会等。司马中原表示：“三十年来在文学的教育、文艺的影响上，卓然而且能够影响年轻一代，朱西甯先生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性人物。”<sup>④</sup>

① 见朱西甯，《一朝风云二十八年：记启蒙我和提醒我的张爱玲》，《中国时报》，1971年，5月30日~31日。

② 朱西甯，《我与台湾》，《有情岁月四十年——新生报副刊辑》（台北：台湾新生报，1985），第2页。

③ 朱天文，《花忆前身》，第37页。

④ 见朱天心，《联合报七十年中、长篇小说奖总评会议纪实》，《未了》（台北：联经，1982），第30页。

朱西甯在军中官拜上校，他的职业生涯走向并非仅仅取决于他的文学，而是归因于国民党政府的宣传政策——在反攻大陆的使命下，作家主导着重要的角色。国民党的历史学者普遍认为共产党的胜利受益于左翼作家的运作与支持，国民党政府遂在一九五一年在台湾成立“中国文艺协会”，以宣扬“中国”文学为名，订定文学为政治军事使命服务的指示。<sup>①</sup> 这个政治目标似乎与朱西甯自己的经历并不冲突。饱受颠沛之苦的他顺理成章地书写有关抗日的小说，《大火炬的爱，1952》协助推展国民党军事性居安思危的战斗意识<sup>②</sup>；《奔向太阳，1971》中的士兵指责共产党“赤化”大陆导致他离乡背井，表达了对蒋领袖的效忠之心，小说人物慷慨激昂地宣告“我们的希望（蒋介石）在这里”。<sup>③</sup> 朱西甯“反共”的主要因素并不完全是政治上的选择，最主要的是，他认为共产党当时崇尚革命的理念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所强调的和谐理念不相同。他表示“复国”的基础乃是社会秩序的稳定，一个社会唯有遵从“道”，关心“地”与“人”的和睦关系，才有社会秩序可言，儒家中强调人与环境的安定“天、地、人”实为朱西甯的处世哲学。<sup>④</sup> 他的《将军与我》、《将军令》便以忠贞的爱国情操为主题，描述军人的精神生活，突出了将领关爱属下的优秀形象。<sup>⑤</sup> 历时十年完成的战争小说《八二三注》阐述了一九五三年大陆炮轰金门的台海战役，表现了战争状态的复杂性，还有人们在非常时期显现的美好德行，例如军民结合，舍己救人的伦理情节。<sup>⑥</sup> 父亲成功的写作生涯直接加深了他对女儿教育的功能，《八二三注》承载了父亲的民族思想与情感，强化了朱天文一种肩负社会责任的“反共”主义。<sup>⑦</sup>

① Helmut Martin,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Towards Cultural-Political Identity", Published by Richard Wilhelm-übersetzungszentrum, Ruhr University, Bochum, No. 3 (June, 1995): P. 2.

② 朱西甯，《大火炬的爱》（台北：重光文艺出版社，1952）。

③ 朱西甯，《奔向太阳》（台北：陆军出版社，1971），第173页。

④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北京：三联书店，1987），第74，133页。

⑤ 朱西甯，《将军与我》（台北：洪范出版社，1976年）；《将军令》（台北：远流出版社，1989）。

⑥ 朱西甯出色的文章与对军队的忠诚受到国民党赏识，曾代表蒋介石名义慰问伤兵家属。朱西甯，《八二三注》（台北：三三，1979），第891页。

⑦ 朱天文曾为文《素读八二三注》抒发对战争小说中所透露的“非战争处”（意指人物的家常生活、个性表征与人道思想）尤为欣赏，见朱天文，《三姐妹》（台北：皇冠出版社，1985）。



值得注意的是，七十年代国民党禁止五四作家作品在台出版时，朱西甯则大力鼓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重要性，这点表明了朱西甯并非全然盲目效忠国民党，而是一位独立的思考者。一九六三出版的小说集《铁浆》、《狼》和《冶金者》，<sup>①</sup>以现代主义的笔法写成，着墨于人的英勇个性，带有强烈的北方乡土气息，张爱玲赞美《铁浆》：有如“战国时代的血性，在我看来是我与多数国人失去了错过的一切。”<sup>②</sup>得到前辈这样的评价，朱西甯无疑是欢喜的，很明显地，他并不容许自己浪费时间在轻松的题材上，写作对他来说是严肃的，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事业，直到他去世前，酝酿十多年所写成的五十五万字的巨著《华太平家传》即是个有力的说明。<sup>③</sup>朱西甯强调“道统”说，不仅重视人格修养，教育精神，也极为注重以写作传道的思想。韩愈《师说》提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谓‘道’，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子，孟子之后而不得传焉的道。<sup>④</sup>从广泛的角度来看，朱西甯信奉的是融合传统与西方思想的“中国化基督教”<sup>⑤</sup>，上教堂、做礼拜是朱天文的家庭活动，这份信仰促使朱天文对中西文化质量经常进行比较，并在日后寻求一个涵盖中、西方和谐的宇宙观。

朱西甯坚信一个作家与他自己的民族文化就像血缘的关系，在肯定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时，也认为自己有维护中国传统文学遗产的义务。我们当然无须争辩这个观念是否属实，朱西甯为两个女儿（天文、天心）取名时用了中国古典文论《文心雕龙》一书的前二字，充分反映了他的文学抱负与视野。<sup>⑥</sup>他认为孩童从小读中国文化的传世之作如唐诗、三国、西游记，“即与人世亲而无间，这种看书一如于现世家常里亲见尊长进退应对，待人接物”。<sup>⑦</sup>他贬责西方童话，“公主王子只是哄孩子办

① 朱西甯，《铁浆》（台北：远流出版社，1989 [1963]）；《狼》（台北：三三书坊，1989 [1963]）；《冶金者》（台北：三三出版社，1986 [1970]）。

② 朱天文，《花忆前身》，第35～36页。

③ 朱西甯，《华太平家传》（台北：联合文学，2002）。

④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北：学生书局，1996），第2页。

⑤ 基督教自明末中国化，参见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⑥ 朱西甯，《朱西甯自选集》（台北：黎明文化，1974），第3页。

⑦ 朱天心，《未了》，第5页。